

中国社会转型研究丛书



明清社会 转型研究

谢宏维 等◎著 ■■■

Mingqing Shehui
Zhuanxing Yanjiu

 江西人民出版社
Ji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出版社

明清社会 转型研究

谢宏维 等◎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Ji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明清社会转型研究 / 谢宏维等著. — 南昌 :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6.12

(中国社会转型研究丛书)

ISBN 978-7-210-07569-1

I. ①明… II. ①谢… III. ①社会转型—研究—中国—明清时代 IV. ①D6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307219 号

明清社会转型研究

谢宏维 等著

策 划: 游道勤

责任编辑: 陈子欣

封面设计: 同异文化传媒

出 版: 江西人民出版社

发 行: 各地新华书店

地 址: 江西省南昌市三经路47号附1号

重点图书出版中心电话: 0791-86898683

发行部电话: 0791-86898815

邮 编: 330006

网 址: www.jxp-ph.com

E-mail: swwpublic@sina.com web.jxp-ph.com

2016年12月第1版 2016年12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毫米 × 1092毫米 1/16

印 张: 25.25

字 数: 420千字

ISBN 978-7-210-07569-1

赣版权登字—01—2017—330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定 价: 52.00元

承 印 厂: 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CONTENTS

学术研究的“问题意识”与“非问题意识” 方志远/1

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与海外中国学 方志远/22

历史研究无“误区” 方志远/51

“冠带荣身”与明代国家动员

——以正统、景泰、天顺年间赈灾助饷为中心 方志远/58

“传奉官”与明成化时代 方志远/87

明朝百年的社会进步与社会问题 方志远/131

明清湘鄂赣地区的“讼风”与地域文化的转移 方志远/139

竟陵派与晚明时代 商传/175

略论晚明的人文主义与社会转型 商传/196

晚明社会转型的历史思考 商传/219

明代漕运总督述论 谢宏维 李奇飞/229

明代江西仓储述论 谢宏维 温小宏/262

清代徽州棚民问题及应对机制 谢宏维/275

棚民、土著与国家

——以清中期江西省万载县土棚学额纷争案为例 谢宏维/296

清中晚期至民国时期江西万载的土客冲突与国家应对 谢宏维/315
文本与权力：清代至民国时期江西万载地方志分析 谢宏维/326
从“苏松重赋”到“三饷”均摊 方兴/352
略论明朝万历年间的“进献助工”热 方兴/364
明代科举中的“同等学力” 方兴/375
清代陵寝与堪輿：基于制度与权力层面的考察 方兴/380

学术研究的“问题意识”与“非问题意识”^{*}

方志远

“问题意识”及因“问题意识”而产生的成果早已有之。两千多年前秦始皇君臣关于“封建”与“郡县”的讨论，贾谊《过秦论》对秦朝二世而亡的分析，都可以说是由“问题意识”催生的作品。当然，如果要归类，这些作品大抵应该归于“社会”或“人文”学科，更确切地说，是“历史学”或者是“政治学”的范畴。随着学术的发展，学科的分类越来越细，“隔行如隔山”并非虚言。尽管各学科之间，客观、求真的科学精神是一致的，但不同学科的不同特点，也决定了研究方法和表述方式的不同。本文拟以历史研究为关照，就学术研究中的“问题意识”略抒己见，希望能够引起共鸣，更希望能够得到批评。

一 “问题意识”的是与非

学术界对“问题意识”的认识，从来没有像最近二十年特别是进入 21 世纪

^{*} 此文为作者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明代多元化社会的形成与国家应对”(10ZSE20)的阶段性成果。在酝酿和写作过程中，曾与王小盾、刘晓明、孙卫国、谢宏维、叶群英诸教授讨论，得到他们的鼓励；学生余辉帮助通读原稿、核对引文、完整注释，两位匿名评审专家提出了建设性意见。一并致谢。

以来这样强烈，强烈到成为学术研究乃至公共话语的重要甚至“核心”理念。^①硕士、博士研究生的开题报告、论文答辩，必须回答的问题是：你的问题意识是什么？你准备解决或者已经解决了什么“问题”？等等。弄得一些博士、硕士也忘乎所以地宣称：“这个问题已经被我解决。”更有不少学者现身说法，指明自己的成功经验，乃是持续不断的“问题意识”的结果，因而倡导青年学者增强“问题意识”。^②从某种意义上说，“问题意识”之被特别提出并且能够成为学术研究的“核心”理念，又是与“国际接轨”的结果。^③而在当今中国，任何事情一旦贴上和“国际”接轨的标签，遂成时髦。“问题意识”也如此。^④

毫无疑问，“问题意识”是基本的科学精神，是人们不断探求未知、不断破解难题的强大动力。可以说，无问题意识便无科学技术的进步，无问题意识便无学术研究的推进，无问题意识便进不了学术之门。“问题意识”的强化，对中国大陆的学术研究已经产生并将持续产生重大影响，不仅各类学术著作和论文的数量以几何级数增长，而且有大量高品质的作品问世。

但是，毋庸讳言的是，被社会诟病的“硕士不硕”、“博士不博”的现象，以及著作等身、思想贫乏，学者成堆、大师稀缺的状况，却也不能不说与“问题意

① 姚亮教授在《学术研究中的问题意识》一文中，开宗明义提出：“问题意识是学术研究的核心要义。”（《学习时报》2013年12月2日）黄寿高、吴兴二位学者的《到底什么是问题意识》（《上海教育科研》2006年第1期），根据“中国期刊网镜像站”的资料统计，从1995年到2004年，十年之间，国内学者发表的与“问题意识”有关的论文数量，依次是：1、7、9、13、17、21、53、80、110、112篇。最近十年应该更多。

② 参见黄宗智：《问题意识与学术研究：五十年的回顾》，《开放时代》2015年第6期。

③ 俞金吾教授的《问题意识：创新的内在动力》（《浙江日报》2007年6月18日，第11版）列举了德国哲学家克罗纳、英国哲学家波普、美国哲学家杜威等人关于“问题意识”的主张或者通过“问题意识”所取得的成果。

④ 本文的一位评审专家指出：“问题意识本是西方社会科学借鉴自然科学的方法，即提出问题假说，指出问题现象，然后找数据和材料进行解释，完成问题模式，然后经过验证。如在使用者那里得到证明，新理论就产生了。”这种由西方社会科学借鉴自然科学的“新理论”产生的方法固然可以借鉴，但如果要运用于文史哲等人文学科并成为“核心”或“基本”方法，则存在诸多问题。

识”的过于强烈有一定关系。^①因为,过于强烈的“问题意识”,违背了人类思维的一般规律,容易导致忽略过程直奔结果、关注细节忽略大局,特别是容易助长急功近利的浮躁心理和立竿见影的实用主义。

所以,在对一些尚未步入学术门槛或者虽然已经步入门槛却仍在徘徊的学者,建立或强化“问题意识”,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在“问题意识”已经成为时髦、成为标签的今日,给“问题意识”降降温,应该说也有必要。少一些“问题意识”,多一些“非问题意识”,学者的生产欲望可能会少一些,科学精神或许会多一些;科研成果可能会少一些,传世之作或许会多一些;著作等身的学者可能会少一些,博学通达的学者可能会多一些。这或许也是“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当缺乏问题意识的时候,我们倡导多一些问题意识;当问题意识过于强烈的时候,我们倡导多一些“非问题意识”。

这里所说的“非问题意识”,并非不要“问题意识”,而是在一定程度上淡化问题意识,关注“问题”之外的事物、关注看似并非“问题”却是问题所由发生的事物。具体地说,是在欣赏过程中发现问题、在培育情怀中超越问题。如果说“问题意识”是务实,“非问题意识”便是务虚。这样,当我们回过头来重新看“问题”的时候,或许可以更加深刻地认识问题。也就是说,当急功近利的“务实”冲动使我们“只顾拉车”而“无暇看路”的时候,“务虚”的客观冷静可能将使我们适时放缓脚步并调整前进的方向。

问题、意识、问题意识是三个相互关联又相互独立的概念。“问题”是人们在认知自然、认知社会、认知自我的过程中自然而然生成的,“问题意识”则是人们在认知自然、认知社会、认知自我过程中积极寻找问题并试图解释或者解决这些问题所产生的意图或动机。

人类认知自然、认知社会、认知自我有其自身的规律,有一个从“无意识”到“有意识”,从“有意识”到意识到“问题”、再到产生“问题意识”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无意识是有意识的前提与基础,有意识则是问题意识的前提与基

^① 当然,“硕士不硕”、“博士不博”的现象,以及著作等身、思想贫乏,学者成堆、大师稀缺的状况,有更深层的社会原因,“问题意识”的过于强化只是这些深层的原因在学术要求上的表现而已。

础。弗洛伊德将其归纳为人类思维活动的潜意识、前意识、意识三个层次的递进。在弗洛伊德看来，潜意识恰恰是人类更深层、更隐秘、更原始、更根本的“心理能量”，是人类一切行为的“内驱力”。正是这些心理能量、这些内驱力，从深层支配着人的心理和行为，成为人的一切动机和意图的源泉。但是，人们首先感觉到的，却是最表层的意识，然后才是前意识，而最容易被忽略的，恰恰是最为重要的潜意识。^①所以，弗洛伊德在展示他的研究时，是从最容易感觉到的意识开始，向不易感觉到的前意识、潜意识逆向推进。而且，即使在“意识”这个层面，也有从“意识”到“问题意识”的递进；而在“潜意识”发生的过程中，还应该经历过“无意识”。从这个角度说，“问题意识”恰恰是思维的表层现象，而“非问题意识”才是思维的深层现象。

可以说，从无意识到有意识，从非问题意识到问题意识，从客观存在的问题到人们认识到问题，从人们认识到问题到产生解释或解决问题的愿望和动机，是人类的认知过程或者说是人类思维的一般规律。与此同时，新一轮的潜意识、前意识、意识，新一轮的无意识、有意识、问题意识，以及问题意识、意识、无意识的思维循环，也早在人们的不自觉中开始。在这个过程或循环中发现问题和带着目的寻找问题，是两个不同层级的不同意识。人们发现的问题，有些可能随着人们生活阅历的丰富、知识积累的充实以及社会文明的进步而自然化解，有些则如影随形、挥之不去，甚至随着人们认知水平的提高、生活阅历的加深、社会文明的进步反复出现。正是这些如影随形、挥之不去的问题，才有可能导致人们产生“问题意识”，导致人们产生解释或解决问题的意图和动机，或者说，只有这些问题，才是真正需要启动“问题意识”进行破解的问题。

所以，从认识到问题到产生解释或解决问题的意图和动机，同样有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对“问题”是要进行“筛选”的，而这种“筛选”也多是自然而然的结果。如果跳跃过程直接寻找问题、跳过筛选直接解决问题，寻找到的问题固然多、解决的问题固然多，但未必是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而省略过程直

^① 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孙名之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中提出关于“潜意识”(有学者译为“无意识”)的概念,后来又在《精神分析引论》(高觉敷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精神分析新论》(郭本禹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中不断完善和丰富了关于潜意识、前意识、意识这一人类思维方式的理论。

奔结论，往往是欲速而不达。犹如前些年在学术研究中同样时髦的“填补空白”。当“填补空白”说刚刚兴起的时候，“填补空白”是对学者研究成果的最高褒扬；而当“填补空白”成为时髦、成为标签时，对成果鉴定不说“填补空白”就等于说这项成果没有价值。但是，难道所有的“空白”都必须“填补”吗，或者说，难道所有的所谓“问题”都需要去花大力气解决吗？^①

过于强烈的“问题意识”，容易在认知的两个阶段发生“问题”。第一，在学习阶段或积累阶段，它跃过欣赏材料、感知材料的过程，而这恰恰是学习和积累阶段的必须过程。第二，在研究阶段或突破阶段，它妨碍了直接从材料出发，而是将已有研究作为起点或作为“靶子”。从学术史的角度看，许多“问题”其实是学者在研究过程中的“预设”或者“失误”，其中不少属“伪问题”。如果不是从“预设”或“失误”出发，而是从原始材料出发，完全有可能直接“论从史出”。这其实是学术研究的两个途径，是从“问题”出发还是从“材料”出发，是“论从史出”还是“论从论出”。^②

有学者将“问题意识”概括为“发现问题，界定问题，综合问题，解决问题，验证问题”五个环节，认为这五个环节构成一个完整的问题意识。^③这种概括是有道理的，特别是对于自然科学而言。但是，这种概括严格地说也只是对自然科学更为适合，对社会科学，特别是对人文学科则未必如此拘泥。如上文所说，发现问题其实有两种情况，一是在过程中的“自然而然”，一是带有某种目的的“刻意寻找”。后者可以归为“问题意识”，前者却属“非问题意识”。在自然科学中，“验证问题”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无法验证，结论就谈不上是科学的、客观的。但在社会科学特别是人文学科中，强调“验证”却过于苛求。而且，越是涉及“人”，

① 邱振中教授和我讨论这一问题时戏称：上衣的背后有那么多空白处，裁缝为何不填补空白多做一些口袋，以便小偷光顾？虽是戏言，但也可说明许多的所谓“空白”、许多的所谓“问题”，是无须花大力气去填补、去解决的。等到人们发现上衣背后的那些空白处确实有价值时，再填补不迟。但那个时候的填补，成本会降低许多，而且功能也不是我们现在的智慧所能想到的。

② 这段论述是在和王小盾教授的学术通信中得到的启示，可以说主要是陈述或阐释他的观点。

③ 劳凯声：《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学理意识和方法意识》，《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

越是涉及个体的思想和行为，就越是难以验证乃至无法验证。

以史为鉴，从历史中吸取经验和教训，可以说是中国历代统治者乃至大众都十分重视的事情。前文提及的秦始皇君臣正是从历史经验和教训中讨论秦朝的制度建设。周朝为何灭亡、我朝如何长久？讨论的结果，是西周分封子弟，数代之后关系疏远，遂至诸侯纷争、天下大乱。这个结论无疑是有一定道理的，而且此后还部分地被西汉分封、完全地被西晋分封所“验证”。但是，由于这场讨论的主角秦始皇过于直奔主题，“问题意识”过于强烈，过于“功利”，致使完全不屑于不同的意见，完全无视西周分封的意义和价值所在，特别是忽略秦统一中国后“封建”理念的惯性影响及对“分封”进行改造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所以，尽管废分封而行郡县，秦朝却是二世而亡，比西周的瓦解迅速得多。但它的大趋势却是对的。继秦而起的西汉顺其自然、因势利导，秦朝进两步，西汉退一步，在中央势力能够达到的地区行郡县制，中央势力一时难以达到的地区在郡县之上同时建立王国加以控制（始为异姓王国后为同姓王国），是为郡国并行。这个措施看似无为而治，却符合当时的客观形势；看似制度倒退，却成就了两汉的大一统。但是，当西晋刻意效法时，却同样是二世而亡。贾谊《过秦论》对秦朝二世而亡的反思，固然也是带着“问题意识”，但这时的“问题意识”已经升华为一种人文情怀，是在更高的层次讨论王朝的兴亡过程。而且，这个问题也并非只是贾谊在关注，而是“自然而然”地摆在人们面前，全社会都在“自然而然”地讨论、“自然而然”地进行总结。此后，柳宗元、苏轼等人也加入到“封建”与“郡县”的讨论之中，顾炎武则在分析“封建”与“郡县”的利弊中，提出“寓封建于郡县之中”的折中方案。^①

“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在考察了当年楚汉相争的战场后发表评论：“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②被阮籍称为“竖子”的，自然是汉高祖刘邦，以及被他打败的对手项羽。暂且不论作为学者的阮籍的不知天高地厚，但他的说法却在不经意

① 贾谊：《过秦论》，《汉书》卷三一《陈胜项籍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821—1825页；柳宗元：《柳河东集》卷三《论·封建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新一版（原中华书局版），第43—48页；《苏轼文集》卷五《论封建》，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57—158页；顾炎武：《顾亭林诗文集·亭林文集》卷一《郡县论一》，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2页。

② 《晋书》卷四九《阮籍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361页。

间重复了陈胜的理念：“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帝王的出身和个性是没有固定版本的，虽然我们可以寻找到其间的共同点，但作为个体的汉高祖刘邦却是前无古人后鲜来者，既难以复制也无法验证。一个底层亭长，一个不务正业的混混，一个动辄称儒生为“腐儒”的半文盲，一个几乎被所有的读书人看不起的人，在年过半百的时候，竟然借着秦末农民战争之势，夺取天下，做了皇帝。而父亲为他树立的榜样、种田能手哥哥刘仲，却在这个乱世之中受其奚落。但是，两百多年之后，也是两兄弟——刘缤、刘秀，哥哥刘缤有刘邦的气象，弟弟刘秀却有刘仲的爱好，但最后“复兴汉室”的，却不是酷似刘邦英雄气象的刘缤，却是颇类刘仲的种田能手和经营高手刘秀。

在人文学科，可以探求也必须探求人类社会发展的的大趋势、总规律，但在具体问题上如果强行要“验证问题”，其结果一般都是大跌眼镜，这和自然科学可能恰恰相反。这也导致“历史教训”人人都想吸取、“历史经验”人人都想提取，但真正能够顺利吸取、成功提取的，却又十分罕见。历史问题，人的问题，从来就不是一加一可以等于二的。

二 欣赏过程 发现问题

坦率地说，撰写本文之前，没有任何“问题意识”，完全是从“欣赏过程”中产生的兴趣、生成的潜意识。回想起来，大概和曾经读过的几种文献以及自己的学术经历有关。

第一种文献是老子的《道德经》（暂且从众说，视老子为《道德经》的作者）。《道德经》中有两段流传甚广的话。第一段：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
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窾）。（卷上《体道第一》）^①

^① 按：注《道德经》者甚多，见仁见智，歧义百出。就笔者看来，由于“语境”的接近，越早的注本应该越接近原意，所以主张读《道德经》以“河上公”及王弼的注本为主。本文所引《道德经》及注，皆依“河上公”本。

这一段话是《道德经》的开篇，不但为喜好者津津乐道，也为学术研究、历史研究揭示了一些有趣的“常理”和“人情”。而在我看来，“人文”学科的研究态度，最好是“循常理、顺人情”。

《道德经》的这段话给我的启示是：其一，“可道”之道，即通过人们观察、领悟并描述出来的“道”，其实已非客观存在的“道”，因为客观存在的道是不可“道”或难以“道”的。虽然我们不断地想探讨历史的真相乃至试图“复原”历史，但历史的真相是不可能被穷极的，历史的原貌也是不可能被复原的；尽管我们不断地想揭示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但我们所描述的仍然只是已经发生的事实，很难相信人类以后的发展真会像现在的人们所预测的那样行进。其二，虽然如此，我们仍然要通过各种的努力，尽可能地揭示接近于历史真相的历史，尽可能在局部和细节上复原可能符合历史真实的历史，尽可能地在趋势上预测人类历史发展的方向，并且不断随着时代的行进，修正这些预测。这正是历史研究的基本动力和终极价值。也就是说，虽然这些被描述的“道”并非完全是客观存在的“道”，但仍然得继续去探求“道”、描述“道”。其三，那么，如何尽可能地揭示接近历史真相的历史、如何尽可能在局部和细节上复原可能符合历史真实的历史、如何尽可能地在趋势上预测人类历史发展的方向，如何使“可道”之“道”接近“常道”之“道”？那就应该是既“无欲”而又“有欲”，无欲和有欲在这个过程中应该是相辅相成、不可偏废的。

《道德经》所谓的“无欲”，我喻之为“非问题意识”。只有不带任何的成见、任何的企盼、任何的预设，才可能客观地欣赏历史发展的过程、真切地感受历史发展的脉搏、欣喜地发现历史发展的无穷妙趣，或许能够从中领悟到历史的某些规律。所谓的“有欲”，我喻之为“问题意识”。我们在欣赏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发现其间的关节和问题，并且产生出解释或解决这些关节和问题的动机和愿望，同时将这些关节和问题置于历史发展的过程之中，做出我们的判断、推进我们的研究。如果没有“无欲”地欣赏过程，也就难以真正“有欲”地解释或解决问题。

《道德经》的另一段话是：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卷上《象元第二十五》）

这段话简洁而富有节奏，熟悉的人更多。有朋友提示，这段话的要害，就是“人法自然”。可以说是一句中的、直奔主题。

但是，明明一句话可以说完的事情，老子为何要分四句，读起来甚至有些“玄之又玄”？这就是我们对老子的不理解了，说到底，老子是在强调事物的“过程”。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关于孔子见老子的一段文字，有利于我们理解老子为何一句话分四句说。《史记》说，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对孔子有一番告诫：

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①

老子让孔子把自己的诸多欲望、诸多想法，以及时时以文武、周公代言人、继承人自居的傲气，统统放下，这样才能平心静气地讨论“礼”。“圣人”孔子尚且多欲，尚且多骄气、多态色、多淫志，何况我等凡夫俗子。

所以，“人法自然”要有一个过程。首先是“法地”。地的特点是：“安静柔和，种之得五谷，掘之得甘泉，劳而不怨也，有功而不制也。”只有放下种种欲望，像地那样安静平和、奉献不争，然后才可能“法天”。天的特点是：“湛泊不动，施而不求报，生长万物，无所收取。”只有像天那样光明无私、包容万物，然后才可能“法道”。只有像“道”那样清静、那样无声无息、那样一切自成，然后才可能“法自然”，才可能像“自然”那样，没有羁绊、没有崖岸，生生不息、永不停顿。说到底，人法自然，是要一切因势利导、顺乎自然。但即使是这样，也只能是“法自然”而不可能就“成自然”。

这也可以说是一种研究的境界，这个境界并非刻意为之，而是“顺乎自然”，才能接近于“道法自然”、水到渠成的结果，研究的结论才可能更加循乎常理而顺乎人情。

^① 《史记》卷六三《老子韩非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140页。

第二种文献是王阳明弟子所录的《传习录》。《传习录》收集了王阳明与朋友及弟子有关学术的通信，以及和弟子们讨论学术的对话。其中王阳明和弟子薛侃之间关于“花”与“草”的对话，在某种程度启发了我对“问题意识”与“非问题意识”的认识，特别是在“欣赏过程”中“发现问题”的感受。节选如下：

（薛）侃去花间草，因曰：“天地间何善难培、恶难去？”

先生曰：“天地生意，花草一般，何曾有善恶之分？子欲观花，则以花为善，以草为恶；如欲用草时，复以草为善矣。此等善恶，皆由汝心好恶所生，故知是错。”

曰：“然则无善无恶乎？”

曰：“无善无恶者理之静，有善有恶者气之动。不动于气，即无善无恶，是谓至善。”

曰：“草既非恶，即草不宜去矣。”

曰：“如此却是佛、老意见。草若有碍，何妨汝去？”

曰：“如此又是作好作恶？”

曰：“不作好恶，非是全无好恶，却是无知觉的人。谓之不作者，只是好恶一循于理，不去又着一分意思。如此，即是不曾好恶一般。”^①

薛侃关于花善草恶的认识，可以说是“问题意识”，也可以说是“有欲”；王阳明的“天地生意，花草一般”，可以说是“非问题意识”，也可以说是“无欲”。只有持“无善无恶”的“非问题意识”，才可能发现：在我们的认识中，当“以花为善”时，往往“以草为恶”；当我们“欲用草时，复以草为善”。假如“问题意识”过于强烈，站在“今日”或“现时”的立场上，立即判断花为善而草为恶，必欲除之而后快。而在另一个时空设定下，发现曾经认为“恶”的草，对于人类甚至比一直被认为“善”的花更为可贵时，草已经在当时的“善恶”的“意识”下被铲除殆尽。

^① 王守仁：《王阳明全书》卷一《语录一·传习录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9页。

所以，后来王阳明给弟子不断宣讲他的“四句教”：“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①由“无善无恶”到“有善有恶”，由“知善知恶”到“为善去恶”也是一个过程。没有这个过程，直接为善而去恶，所去之恶未必是真恶，而所为之善也许并非真善。

学术研究其实也是这样，以明史研究为例。明太祖曾经杀功臣、杀贪官、剥夺富人、打击持不合作态度的文人。此是“善”还是“恶”？对当时的和此后的明朝有何“善”果、有何“恶”果？明神宗三十年不上朝，除了和皇室利益有关之事，大抵不过问，明朝官场及明代社会在“惯性”中运行。此是“善”还是“恶”？对于明代社会的开放和明朝的灭亡有何“善”果、有何“恶”果？我们只有站在当时人、后世人的双重立场上，在“欣赏”的过程中，用陈寅恪先生的话，建立在“理解之同情”的立场上，才可能做出更加合理的解释。

如果我们把目光从花与草、从明朝的存与亡，延伸到中国传统文化，何为善、何为恶？何为精华、何为糟粕？道家是善、是精华？但老子的“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不是被批判为小国寡民、与世隔绝？儒家是善、是精华？但儒家的“中庸”、“仁义道德”不也曾经被批判为伪善？那么佛家是善、是精华？基督教是善、是精华？如果用我们通常所说的概念，“留其精华、去其糟粕”，那么，道家、儒家、佛家、基督教中哪些是精华、哪些是糟粕？去后、留后还叫道家、儒家、佛家、基督教吗？

虽然王阳明不断教诲弟子，遇事不要“着相”、心中要少一些“芥蒂”，要“儒佛老庄皆为我用”，但王学末流的“空疏”仍然为世所讥。虽然更多是因为时代所赐，但也不能不说和王阳明自己的急迫有关。《传习录》中收录了王阳明自撰的《朱子晚年定论序》：

守仁早岁业举，溺志辞章之习，既乃稍知从事正学，而苦于众说之纷挠疲迹，茫无可入。因求诸老释，欣然有会于心，以为圣人之学在此矣。然于孔子之教，间相出入，而措之日用，往往缺漏无归；依违往返，

^① 王守仁：《王阳明全书》卷三《语录三·传习录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17页。

且信且疑。其后谪官龙场，居夷处困，动心忍性之余，恍若有悟。体验探求，再更寒暑，证诸五经、四子，沛然若决江河而放诸海也。然后叹圣人之道，坦如大路，而世之儒者，妄开窦，蹈荆棘、堕坑塹，究其为说，反出二氏之下。宜乎世之高明之士，厌此而趋彼也，此岂二氏之罪哉！^①

王阳明自己经历过“溯志词章”、“从事正学”、“求诸老释”的长期探索过程，又有“居夷三年”的感悟，^②并经历了剿灭南赣汀漳民变、平定南昌宁王宸濠兵变，以及应对各种复杂局势的经历，才提出“良知”的心得，自称这一心得是从“百死千难”中所得。但是，王阳明一方面担心学生“得之容易，把作一种光景玩弄，不实落用功”，一方面又唯恐学生走了弯路，故而“不得已与人一口说尽”。^③于是往往忽略过程，直接讲求“尽性至命”、直接带人“良知”。犹如时下所谓的“心灵鸡汤”，在修心养性上或许立竿见影，但在修习学术上，如果不是本来学有根基，那就只能是“空疏无物”。

第三种文献是徐复观的《我的读书生活》。

徐复观先生在《我的读书生活》中，说到拜熊十力先生为师的一段轶事：

第一次我穿军服到北碚金刚碑勉仁书院看他（熊十力）时，请教应该读什么书。他老先生教我读王船山的《读通鉴论》，我说那早年已经读过了。他以不高兴的神气说：“你并没有读懂，应当再读。”过了些

① 王守仁：《王阳明全书》卷三《语录三·传习录下·朱子晚年定论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27—128页（标点略有改动）。

② 按：王阳明每每称自己“居夷三年”，真正在贵州的时间，应该是一年零九个月左右。据《阳明年谱》，阳明于正德二年春离京南下；正德三年春未到贵州龙场驿；正德五年三月，抵达江西庐陵县任知县，分见《王阳明全书》卷三三《年谱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227、1228、1230页。这个经历从王阳明的诗文中也可以证实。又，《明史·王守仁传》说：“（刘瑾诛，（王守仁）量移庐陵知县。”今人研究“王学”者多从此说。但刘瑾“诛”在正德五年八月，而王阳明在正德四年底得到调任庐陵知县的文书后，即离开龙场驿，这年的除夕是在往庐陵的舟中度过的。见《王阳明全书》卷十九《外集一·舟中除夕二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714页。

③ 王守仁：《王阳明全书》卷三四《年谱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279页。